

# 「文革」前彭真對中共首都的管理： 政治方針、領導方式和幹部政策\*\*

鍾 延 麟

(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助理教授)

## 摘 要

彭真在「文革」前的中共政治中地位重要而特殊。他一方面是參與決策、職司執行的中央領導人；另一方面，又負責管理首都北京市，作為最有力的地方領導人之一。彭真長期主管北京市，反映中共中央對他的政治信任和器重，以及對其稱職表現的欣賞。彭真管理北京市的理念是：信從緊跟中央、工作力爭楷模，以及營造首都格局。在實際管理上，彭真主要掌握首都的重要事務，其他具體工作則由副手劉仁、鄭天翔等人處置。如此使之既可管控首都發展方向，又能節省心力處理中央事務。彭真的政治能力和前景，以及對地方利益和人事的關照，令之在當地享有高度的領導威信。彭真在相關職位上的積極有為，也讓之在政治上增加不少的見光度、發言權和影響力。「文革」前夕，北京市在密集配合中央的政策實驗、摸索的過程中，彭真與人多有衝突，招致經營「獨立王國」的指控和批判，更進而損及他在中央的政治地位和安全。

彭真在「文革」前長年執掌北京市，讓其在「改革開放」時期仍可對該地施加影響；更重要的是，此一任職經歷讓彭真累積、擁有了一筆重要的人脈資產，並成為他在 1980 年代領導中共法制工作時所倚重使用的幹部隊伍。

**關鍵詞：**彭真、北京市、政治管理、中共政治

---

\* 本文初稿「彭真對『文革』前中共首都北京市的政治治理：理念、人事和影響」，發表於「全球視野下的中國近代史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二十世紀中國史學會主辦，2014 年 8 月 13 日）。作者特別感謝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陳永發教授、中國大陸的當代中國史學者李海文研究員，以及其他不便具名的中國大陸研究人員，曾對本文的惠予指導與支持。本文如有任何問題，概由作者自負。作者也感謝兩位審查人所提供的重要建議和意見，以及行政院科技部對本文研究的經費補助（計畫編號：NSC 102-2410-H-004-001-MY2）。

\* 本文聚焦在彭真對中共首都北京市的政治管理，特別是其所秉持的政治方針與考量、領導策略和風格、幹部任用和人事安排，以及造成的政治效果和影響。至於城市治理的議題，例如：都市的政治和文化傳統、都市計畫、市政建設、市民生活…等。則不在本文的探討範圍之內。作者感謝審查人對此問題的提醒。

\* \* \*

## 壹、前言

彭真（1902~1997）在中共蝸居陝北的延安時期，即躋身中央領導層。從 1945 年中共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起，直至 1966 年「文革」爆發以前，彭真皆擔任中央政治局委員，經常參與中央最高決策並分管多項重要工作。彭真在「文革」前作為「黨國要人」的同時，也長期出任中共首都北京市的最高負責人，同時肩挑中共北京市黨委第一書記與北京市市長二職。彭真長時直接領導北京市的黨政工作，舉凡與首都有關的重大政策與決策，皆親自過問與掌握。彭真在該地深耕經營，形成盤根錯節的人脈關係，享有甚高的政治威信與影響力。毛澤東在「文革」前夕批評彭真領導的中共北京市委為「針插不進、水潑不進」的「獨立王國」，雖是上綱上線的政治構陷，但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彭真對北京市的嚴加管控，已確實到了讓毛澤東感到礙手礙腳、不便施展的地步。

關於彭真在「文革」前對北京市的政治管理情形，在現有彭真研究著作中，是一塊值得加以探究、填補的空白。中文方面，中共官方出版的〈彭真傳〉和〈彭真傳略〉，對此雖有所著墨、甚而撰有數章，然也多僅是描述彭真如何領導北京市的政策執行、市政發展與公共建設，沒有專門觀察、系統綜整他對首都的政治管理之道和用人之法。<sup>①</sup>在西方對中共政治和歷史的研究中，彭真雖然也在其關注的行列之內。然而，相關研究主要關心彭真在中共上層的政治活動，<sup>②</sup>或是他對中共政法工作的主張與經營。<sup>③</sup>至於彭真在政治上如何具體管理北京市的問題，通常寥寥數語、簡單帶過。

本文欲處理的問題有：在政治方針上，彭真管理北京市所持的理念和目標為何？在領導方式上，他在中央的工作已極為忙碌之下，如何同時管理首都，並看似管得有

註① 彭真傳編寫組，*彭真傳*（第 2 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2 年），頁 649~738、763~831；彭真傳編寫組、田西如，*彭真傳略*（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年），頁 204~218。

註② 例如：Roderick MacFarquhar,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Contradictions Among the People 1956-1957*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4), pp. 145~146, 202~204, 270~271; Roderick MacFarquhar,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Great Leap Forward 1958-1960*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3), pp. 61, 179, 208~210; Roderick MacFarquhar,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Coming of the Cataclysm, 1961-1966*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156~158, 443~445; Frederick C. Teiwes, *Politics and Purges in China: Rectification and the Decline of Party Norms, 1950~1965*, 2<sup>nd</sup> edition (New York: M. E. Sharpe, 1993), pp. 197~198, 223, 393, 463; Frederick C. Teiwes, Warren Sun, *China's Road to Disaster: Mao, Central Politicians, and Provincial Leaders in the Unfolding of the Great Leap Forward, 1955~1959* (New York: M. E. Sharpe, 1999), pp. 123~124, 136, 144; Jing Huang, *Factionalism in Chinese Communist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140, 147, 150, 225.

註③ Pitman B. Potter, *From Leninist Discipline to Socialist Legalism: Peng Zhen on Law and Political Authority in the P.R.C* (Palo Alto,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聲有色、頗有成效？在幹部政策和組織路線上，他用人情形為何？其在首都有何政治績效並產生什麼政治影響？本文的主要論點為：彭真在「文革」前長期主政中共首都，主要肇因其深受黨中央的信任，以及在當地出色的治理表現。彭真治京的理念是：在政治上緊跟中央、在工作上力爭表率，以作為名符其實的首都。在實際管理上，彭真提綱挈領地掌握重大事務，餘則交由其信任的部屬處置和落實。他的政治能力和前景，以及對地方利益和人事的關照，令之得享崇高的領導威信。彭真治理首都有成，既贏得上級好評和各方注意，也藉之增加政治發言權和影響力。彭真麾下的北京市在「文革」之前常作為政治實驗要地。彭真在其間多與人衝突，益加陷入不利的政治處境。

本文的研究目的在於：重建、還原彭真個人歷史中的一個重要部分，並且對認識中共早期的城市政治管理、中央和地方關係，以至政治史有所裨益。本文使用的資料，包括：官方檔案、「文革」批判資料、回憶資料、傳記、訪談資料，以及相關的研究著作。主要蒐集自中國大陸、香港和台灣。<sup>④</sup>本文的章節安排，除此前言外，有七個部分：首先是說明彭真為何長期被指派掌理中共首都，接下來逐一探討他對北京市的施政理念、管理方法、用人情況、聲望所在，以及相關工作何以是其政治資產、又為何變成政治負擔。在結論的部分，簡單探討彭真在「文革」前的首都管理經歷，在「改革開放」時期產生的政治影響問題。

## 貳、彭真長期受命管理首都的原因

中共在發起平津戰役之前，即已決定將其全國政權定都於北平（後來改名為北京）。<sup>⑤</sup>1948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任命彭真為北平市委書記（他在1951年開始兼任市長）。何以彭真獲命管理中共首都？可能的原因有：

一、彭真的政治出身是所謂的「白區」幹部，亦即在敵人佔領的都會地區中從事地下活動，對於城市工作較為熟悉。彭真早期活動的區域在華北地區，更曾直接在北平工作，對當地情況有一定的了解。事實上，他在延安時期被任命為中央城市工作部部長。該機構成立的用意即在為中共未來朝城市發展進行籌劃和準備。<sup>⑥</sup>二、像北平如此規模的大城市的接管與管理工作，需要一位曾具主管一個方面工作的經驗者。彭真在抗日戰爭前期曾領導中共晉察冀根據地的黨務和政權工作，戰後又主持過中共東北

註④ 其中，關於檔案資料的蒐集和使用，請參閱：鍾延麟，「故紙堆中作新文章：檔案研究與中國研究」，《中國大陸研究》，第58卷第2期（2015年6月），頁1~21。

註⑤ 1949年9月27日，北平改稱為北京。中共北京市委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北京歷史大事記（1949~1978）》（北京：北京出版社，2001年），頁1。

註⑥ 彭真在籌建接管北平的政治團隊時，也特別注意納入具有成功接收城市經驗者。例如：曹瑛順利接收長春，其總結的經驗被毛澤東稱許並批轉各地參考。彭真當面力邀曹瑛到北平工作，曹氏因而曾短暫地擔任市委秘書長，之後轉赴湖南工作。曹瑛，《叔世忠靈—曹瑛自傳、詩文選》（長沙：湖南出版社，1997年），頁181、195~196、199。

中央局，有掌管一方的經驗。<sup>⑦</sup>三、北平內部情勢複雜，「黨外上層活動人士」和知識份子叢聚，外國使節常駐其中，也多有海外人士造訪，國際、國內對之都甚為注意，<sup>⑧</sup>因而需要比較細緻、靈活的政治手腕。彭真心思細膩、精力充沛，是一名適合的管理人選。

除了彭真的出身背景、工作資歷，以及領導特質外，中共中央對彭真個人或也有另外的政治考慮。北京市作為首都，如同是在「天子腳下」，不但直接關乎中央的安危，其政治貫徹力也有高度的象徵性和指標性。因此，首都領導人必須忠心耿耿、積極能幹。對毛澤東而言，在對日抗戰期間，彭真從晉察冀邊區調至延安後，即在其身邊工作並密切配合行事，讓之甚感滿意。這也是對日戰爭結束、中共積極進軍東北地區時，彭真被任命出掌東北局的重要背景。彭真在東北遭受其他黨人的質疑，在一定的程度上，也是因為他不變調地忠心執行毛的政策主張所致。<sup>⑨</sup>由於黨內不少高幹部不滿彭真在東北局任內的表現，毛澤東不便在中央太多地重用彭真；但讓彭真擔任「京官」，既符其所長、可免受太大的議論外，也可將之安置身旁、為己所用。

彭真對北京市的領導工作，從 1949 年到 1950 年代中期是第一階段。在此時期，彭真在中央的工作相對較少，主要的工作重心就在北京市，他的相關表現也頗為出眾。彭真首先致力恢復當地生產、整頓經濟秩序，以及維持基本供應，以穩定和爭取民心；他在郊區推行土改時，也針對實地狀況採取較為穩健的政策，避免產生太大的震盪和波動。在鞏固中共統治和政權方面，彭真大張旗鼓地執行鎮壓反革命運動，成功確保中央黨政首腦機關的安全。<sup>⑩</sup>在針對黨員幹部的「三反」運動（反貪汙、反浪費、反官僚主義）和指向民間商賈的「五反」運動（反對包括行賄、偷稅漏稅、盜竊國家資產、偷工減料、盜竊國家經濟情報的「五毒」），彭真在北京市火速推行，取得豐碩運動成果，受到中央嘉獎和推廣。<sup>⑪</sup>

在中共中央推出向社會主義過渡的總路線政策後，在農業集體化問題上，彭真機敏地尾隨政治氛圍變化，在北京郊區調整政策以求跟進。在私營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問題上，彭真志在掄元奪魁，在鑼鼓喧天之下，他向毛澤東為首的中央「報喜」，同時風光地昭告全國：北京市首先進入社會主義社會。<sup>⑫</sup>

1950 年代中期以後，彭真在中央政治的分工逐步加重，先是奉命接替董必武主管

註⑦ 彭真主管北京之初，曾自述有過管理政權的經驗，並將之含括為：熟悉中央的方針、政策、策略，對實際情況需要調查研究，提出意見，還要學習聯繫群眾、聯繫實際等一套工作方法。崔月犁，「志趣不忘為人民—60 年革命生涯自述」，徐書麟主編，月犁：崔月犁自述及紀念文章（北京：中國中醫藥出版社，2002 年），頁 41。

註⑧ 彭真經常表示：「北京市是中國的首都，各國代表大都在北京住著，外賓訪問中國也是先來北京，政治上的影響是很大的。」陳靜、韓勤英整理，「他為人民、為黨無私奉獻——趙凡同志談彭真」，中共北京市委黨史研究室主編，彭真在北京（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 年），頁 445。

註⑨ 彭真傳編寫組、田西如，彭真主持東北局（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年）。

註⑩ 彭真傳編寫組、田西如，彭真傳略，頁 194~203。

註⑪ 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 70 年，修訂版（台北：聯經出版社，2001 年），頁 636~639。

註⑫ 同前註，頁 647~652。

中共政法工作和負責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委會的日常工作，更重要的是：1956年中共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簡稱「八大」）成立負責管理中央日常工作的中央書記處，彭真被指定協助中央總書記鄧小平「負總責」，實際擔任常務書記的角色。鄧小平希望彭真可以心無旁騖地挑起中央書記處的常務工作，因此曾向中共中央建議彭真不再繼續兼任北京市的工作，但是此一提議並沒有被接受。<sup>⑬</sup>

中共中央、特別是毛澤東為何還要彭真繼續管理北京市呢？可能的考慮有：首先、彭真在中共建政後前七年管理北京市的工作表現，常令層峰滿意，不時被批轉全國各地參考，成為政治先導和政策樣板。其次、彭真一道參與中央領導工作、加入決策討論時，可以從其兼管的北京市工作中，提出一些反映地方觀點、貼近地方需要的一手資訊和經驗。對此，彭真在1962年北京市的人民代表大會上就表示：「我這個第一書記，毛主席讓當，實際是讓大家多了解實際。」<sup>⑭</sup>

## 參、彭真經營首都的政治理念和目標

彭真經營北京市的主要政治理念和目標，包括：將中央的決策和政策忠實、積極、迅速地在北京市貫徹；把北京市的工作辦得有聲有色，在全國各項工作中作為模範、標兵；促進北京市各方面的建設與發展，將北京市辦成有「一國之都」的格局與面貌，成為中國對外的主要櫥窗。以下分別述之：

### 一、戮力在京畿地區貫徹中央的意旨，不敢輕忽怠慢

彭真領導北京市期間，對此原則的堅持和身體力行，長期作為市委「三把手」、擔任市委書記處書記兼秘書長的鄭天翔就有所回憶：

北京市委是堅決執行黨中央的路線、方針、政策的，是堅決執行毛主席指示的，是全力顧全大局，服從大局的。彭真同志經常提出市委要經常檢查自己工作中的缺點及錯誤，堅決加以改正。我們就是這樣做的。彭真同志在中央工作，接觸中央領導、中央各部門和全國各省市區同志的機會比較多，聽到對北京工作的批評隨時告訴我們進行檢查，有缺點就認真糾正。彭真同志在中央開會或聽到毛主席的指示，只要是涉及地方工作又可以傳達的，即時給我們傳達，對重要問題跟我們一起研究如何貫徹執行，並經常檢查執行的結果。<sup>⑮</sup>

註⑬ 彭真傳編寫組，田西如，*彭真傳略*，頁220。

註⑭ 中華人民共和國北京市檔案館藏，「彭真同志在市第四屆一次人民代表大會上的講話記錄」，檔號001-006-02077，1962年6月19日。

註⑮ 鄭天翔，「被顛倒的事實終被顛倒過來」，劉光人主編，*永遠難忘劉仁同志*（北京：群眾出版社，2002年），頁2。

在此背景下，彭真治下的北京市無異於中國大陸其他省市，緊隨著「文革」前的政治脈動起伏。易言之，中共中央領導下走的「正確道路」，抑或是所謂「彎路」、「錯路」，在個別問題上縱有程度上的差異，彭真和北京市皆與之「同呼吸、共命運」。正因如此，毛澤東後來批評彭真領銜的北京市委為「獨立王國」時，市委高幹皆難以置信和接受。<sup>⑩</sup>

## 二、力使北京市的工作在全國範圍內名列前茅，以不枉首都之名號

彭真反覆地向市委各級幹部強調：北京市在各項工作上不但要力求表現，更要「事事都帶頭」，<sup>⑪</sup>以拔得頭籌為職志。他具體提出「以可能達到的最高標準要求我們的工作」。<sup>⑫</sup>鄭天翔後來即表示：「用客觀上可能達到的最高標準要求我們的工作，是北京市委貫穿十七年的指導思想。彭真同志多次講這個問題」；「市委按這個方針進行檢查和佈署，要求自己，要求各方面的工作」。<sup>⑬</sup>

1958 年，彭真進而指示：「北京市的工作在全國應當佔據首位」，「北京市各方面的工作都要站在最前線」。他進而解釋：「前線就是前列，像排隊一樣站在最前頭」。<sup>⑭</sup>為了系統整理、總結北京市的典型經驗，並將之加以理論包裝與宣揚，彭真飭令北京市委辦理理論刊物負責此項工作。彭真將刊物命名為〈前線〉，並親自主持撰寫發刊詞，反映他對首都工作的重大寄望。彭真監製的「北京市經驗」，有時是中央政策的「試驗田」，有時更是全國政策的「策源地」。多次贏得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中央的稱許和表彰。

## 三、力促北京市改頭換面和全面發展，以「首善之區」姿態示人並勝任國家的門面

彭真有心建造北京市，具體提出將之由消費城市轉變為生產城市的建設口號，並

註⑩ 宋汝禁在「文革」前擔任北京市委的領導幹部，其感嘆：「回想『文化大革命』之初，黨中央就把矛頭指向北京市委，要把這個『針插不進、水潑不進的獨立王國』摧垮，其實北京市的幹部從來就是聽中央話的，他們解放前捨生忘死，解放後廢寢忘食地為黨工作。實在想不明白，黨中央為什麼非要把他們揪住不放，非要把他們打翻在地，還要踏上一隻腳。」宋汝禁，「『文革』瑣憶」，中共北京市委黨史研究室主編，*風雨征程*（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 年），頁 205。

註⑪ 孫孚凌，「一生抉擇終不悔」，中共北京市委黨史研究室主編，*風雨征程*（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 年），頁 5。

註⑫ 彭真，「以可能達到的最高標準要求我們的工作」，中共北京市委主編，*站在革命和建設的最前線——彭真同志關於北京工作的言論選編*（北京：北京出版社，1992 年），頁 208~215。

註⑬ 鄭天翔，*回憶北京 17 年*（北京：北京出版社，1989 年），頁 3。

註⑭ 原北京市委、市人委機關舊兵團編印、北京市革命委員會政治組宣傳小組翻印，*砸爛彭真的反革命黑綱領：揭發批判彭真精心炮製和全面推行〈前線〉發刊詞的滔天罪行*（北京：無出版者，1967 年），頁 15。

且順勢利用「大躍進」開展的時機，一再縮短原先規劃時程並加速其發展進程。除了生產事業的建設，彭真也知道建造政治象徵性建築的重要宣傳意義。「大躍進」發起的同年，彭真欣然接受中央下達的一年完成首都「十大工程」的建設任務，既為 1959 年的十年國慶獻禮，也為值在進行的「大躍進」造勢。他最終也確實如期完成。<sup>①</sup>

從「大躍進」後期起一連三年的「經濟困難」，北京市也籠罩在大饑荒的陰影下。彭真用心維持首都政治、經濟、社會、生活各方面的穩定，更對外喬裝中國國內情勢無恙、如常，給人「三面紅旗」成績偉大並仍繼續高舉的印象。

## 肆、彭真在百忙之中如何兼管首都

「文革」初彭真被打倒之後，原本負責為彭真夫婦按摩的護士揭發，彭真曾對她表示：「我對北京市的工作管的不多，你們對我這個市長有意見吧！我主要是負責中央的一些工作。」<sup>②</sup>在中央工作極為繁重的彭真，如何同時對北京市進行有效的政治管理呢？事實上，對北京市的工作，彭真的管理之道是「抓大放小」。亦即彭真主要處理北京市的重大事項；至於北京市委的日常工作，則由彭真倚重的北京市委第二書記劉仁、鄭天翔等人負責。<sup>③</sup>哪些是屬於彭真會過目、掌握的首都大事呢？概括地說，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面：

### 一、涉及北京市委與黨中央和政府之間的互動

針對相關事項，彭真親自予以把關，以作為銜接北京市與中央的關鍵橋樑。有資料表示，彭真主持北京市的黨政領導工作時，設有一項規定：凡是呈送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的文件、資料，或者雖然不是直接呈送領導人本人，但是對於該領導人指示身邊工作人員來電、來函詢問的書面答覆，都必須經彭真親自過目簽字。<sup>④</sup>對於北京市委上呈中共中央的文件，特別是毛澤東會過目、親閱者，彭真最是不敢掉以輕心。這除了因為彭真作為該市主官，需要擔負政治主責，事實上，對上層政治熟悉的他，也較能知道如何在文件報告中呈現論點、突出重點，更因其懂得政治風向，能對相關文件起到「畫龍點睛」的作用。

1958 年 5 月初，在「大躍進」緊鑼密鼓、蓄勢待發的背景下，北京市委擬向中共

註① 鍾延麟，「彭真與中共首都北京市的大躍進運動」，發表於「從台灣來看的中共統治和對外政策」工作坊（東京：中南海研究會主辦，2014 年 6 月 27 日），頁 1-27。

註② 鶴桂林，「我要說！我要講！我要揭露」，戰報（北京），1967 年 1 月 30 日，第 3 版。

註③ 中共中央警衛局原副局長張文健表示：「到『八大』時，他（彭真）是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管中央的事就多了，但在北京市，他抓大事。毛主席、黨中央還是把彭真當作北京市的領導人。彭真只是管大事，他把北京市交給劉仁、趙凡、鄭天翔幾個人管。」李海文、王燕玲，世紀對話：憶新中國法制奠基人彭真（北京：群眾出版社，2002 年），頁 374。

註④ 沈河，「白日點燈案」，藍盾，<http://www.fox2008.cn/ebook/landong/ladu2006/ladu20061112-1.html>。中國大陸一名中共黨史研究者提供的資訊。北京，2014 年 8 月。

中央提交一份規劃大力發展北京工業的報告草案。彭真在審閱時所作的修改，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在審改此一文件的過程中，首先、彭真爲了讓中共中央知道北京市在他的領導下，在工業發展上是有所作爲的，他在說明 1957 年北京市的工業產值後，另外加寫了北京市在 1949 年的工業產值，以顯示這段時間內工業成長的情形。其次、彭真爲了要讓中共中央未來加大對北京市工業投資的力度，他強調北京市現有的工業產值總數，是包括一些位在北京、但由中央管理的國營企業在內，因此仍需要中央給予更大的關注與照顧。最後、彭真在政治上的老練，更可見當報告草案中提到北京市的鋼鐵生產計畫時，他特別註明剛擴建的北京鋼廠的具體生產指標。<sup>⑤</sup>因爲彭真明白毛澤東當時追求鋼鐵生產的急迫心情，他加寫有關文字，可顯現北京市不但堅決地要跟毛走，也有自己相對應的「雄心壯志」，希望共襄煉鋼盛舉。

對於毛澤東關注的重要政治議題，彭真會先行對有關的文件報告定下基調，然後再由其他的市委高幹具體組織起草。彭真有時也會順承上意，適時報送北京市委的相關調查報告，以符合、證成當時中共中央、特別是毛澤東對政治情勢的判斷。譬如：對於「大躍進」之後城鄉基層幹部的狀況，毛澤東抱持狐疑、不信任的態度，認爲約有三分之一比例的幹部已腐化、變質，便推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期以對之除惡、汰舊。1964 年 12 月中旬，彭真核改、呈送鄭天翔起草的〈關於北京市城市社會主義教育運動試點情況的匯報〉給毛澤東等人，其中將北京市主要企業幹部「爛掉」的情況說得甚爲嚴重。<sup>⑥</sup>彭真如此做，無異於其他省市的地方領導人，乃是爲了迎合毛對基層情勢悲觀的估計、投其崇尚階級鬥爭的偏好。

## 二、中共中央發起的群眾運動，在北京市如何貫徹執行的問題

群眾運動是毛澤東時期中共政治的一大特色，亦是中共推行重大政策的重要方法和手段。群眾運動的推行和發展，乃由黨組織策動和領導。因此，黨機關首長必須親自動手、主管運動。彭真對於北京市的群眾運動自是緊握在手。因爲彭真同時跨足中央和北京市，中共推行政治運動期間，他在參加中央高層的會議後，旋即回到北京市委佈置首都當地的運動。北京市的大學負責黨幹後來就回憶：在 1957 年整風運動的「引蛇出洞」階段，彭真和市委「抓得很緊」，幾乎夜夜召集高校幹部開會。彭真參加毛澤東主持的中央政治局會議後，馬上前赴市委召開的會議，傳達最新的運動精神和指示。經由彭真的介紹，市委高幹方得以真正明瞭黨中央欲先引人上鉤、之後再予以回擊的政治意圖。<sup>⑦</sup>

註⑤ 中華人民共和國北京市檔案館藏，「市委有關北京市工業發展規劃向主席、中央的報告」，檔號 00255-05-001，1958 年 5 月 3-7 日。

註⑥ 彭真傳編寫組編，*彭真年譜*（第 4 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2 年），頁 379-380。

註⑦ 劉冰，「北京記憶」，中共北京市委黨史研究室主編，*並不遙遠的記憶*（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 年），頁 218-219。

### 三、關於北京市重大政經發展的領導事宜

有關北京市黨和政府的重要人事任命案、重要會議的主題議程和召開時間、市委與市政府的重要工作報告或計畫、市主要領導人在重要場合的講話草稿，以及北京市委的機關報〈北京日報〉的重要社論和新聞，作為北京市最高黨政首長的彭真，通常會作最後的批改和審定。<sup>⑳</sup>

可得的正式檔案如有：1960年5月5日，劉仁在市委工業交通系統五級幹部會議上的講話內容，事先乃送交彭真審閱；彭真在4日將其修改意見退給劉仁，要其按之修改。<sup>㉑</sup>1963年3月中旬，副市長萬里預定在北京市人代會上作的〈關於郊區農村形勢和任務的報告〉，也經彭真審閱、認可。<sup>㉒</sup>從相關的修改紀錄上，可以看見彭真做事的謹慎、認真。小至標點符號、字句通順，他都會仔細修改。事實上，彭真藉由對此類政治文件文句的修改、更動與加寫，提出他對有關問題的看法。例如：1965年12月31日，〈北京日報〉負責人奉鄭天翔指示，將預定在隔日刊登的社論清樣，送呈彭真審閱。彭真不但修改社論標題，對內文也做了數處修改。其中，針對學習毛澤東思想問題，原稿的文字是「狠狠地抓上三年五年」。彭真將之刪去並改寫為「緊緊抓住這條綱」；他另外在旁略帶質問地寫道：「只抓三五年？以後就不抓了？」<sup>㉓</sup>正因為彭真對北京市委重要文件的重視和緊抓，相關文件在獲得彭真最後審定之前，經常就已修改數遍。<sup>㉔</sup>

對於北京市的日常工作，彭真對劉仁、鄭天翔等人甚為信任與放手。但是當北京市委的其他領導人向彭真匯報與請示工作，他也不會拒絕，而會積極地挑起事來。彭真和劉仁之間經常通電話；<sup>㉕</sup>劉仁、鄭天翔也常出現在彭真的官邸，與之討論北京市工作。<sup>㉖</sup>

關於北京市委的常委會，彭真在一般情況下不會出席。<sup>㉗</sup>這也是從另一個側面顯示彭真沒有參與太多市委的內部討論與具體工作。但是他對常委會中議論的重要事項，特別是有全局性影響的問題，還是有所注意。彭真有時甚至會將之當作向中央獻策時

註 ⑳ 中國大陸一名中共黨史研究者提供的資訊。北京，2014年8月。

註 ㉑ 中華人民共和國北京市檔案館藏，「劉仁同志在市委工業交通系統五級幹部會議上的講話提綱」，檔號 001-015-00432，1960年5月4日。

註 ㉒ 中華人民共和國北京市檔案館藏，「北京市第四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關於郊區農村形勢和任務的報告（彭真同志修改本）」，檔號 002-015-00425，1963年3月16日。

註 ㉓ 中華人民共和國北京市檔案館藏，「彭真、劉仁、萬里、鄭天翔、陳可寒、鄧拓、李琪、趙凡等市委領導同志對本報稿件的審改樣」，檔號 114-001-00225，1965年12月31日。

註 ㉔ 韓伯平口述，蘇峰、楊洋整理，「回憶彭真兩三事」，中共北京市委黨史研究室主編，*研究與憶往：北京市紀念彭真誕辰 110 週年文集*（北京：北京出版集團公司、北京出版社，2013年），頁 300~301。

註 ㉕ 中國大陸一名中共黨史研究者提供的資訊。北京，2014年8月。

註 ㉖ 中國大陸一名中共黨史研究者提供的資訊。北京，2014年11月。

註 ㉗ 「文革」前北京市委常委會成員李琪曾表示：「彭真是很少參加常委會的。」李莉，「憶李琪最後的日子和我的遭遇」，李莉等主編，*憶李琪*（北京：無出版者，2001年），頁 292。

的重要參考與依據。「大躍進」期間，對於農村是否要取消自留地的問題，北京市委常委委會在開會時，內部為此發生爭辯。彭真知曉後將相關辯論的內容向毛澤東轉述，並建議後者允許農民保留自留地。<sup>⑳</sup>

另外，彭真為了確切掌握北京市重要的地方情況，而不與基層脫節，他在自己個人的辦公室中，安排一名秘書專門注意、協助處理北京市的事務，有時甚至會派之旁聽重要的市委常委會會議，回來再向彭作口頭匯報。<sup>㉑</sup>彭真在 1958 年以後的政治秘書，更由北京市委工業部副部長兼任，助其了解市裏基層情況。<sup>㉒</sup>此外，彭真在每年春節前，會召集北京市重要工廠和著名高校的負責人進行座談、徵求意見；<sup>㉓</sup>每年中也會安排幾次與區縣委書記的座談會。<sup>㉔</sup>

## 伍、彭真在首都的主要用人情形

在管理北京市的工作上，彭真對劉仁、鄭天翔的重視，值得作進一步的介紹。

彭真和劉仁結識甚早，兩人在晉察冀時期就有密切的上下級工作關係，彭真指定劉仁發展城市工作。<sup>㉕</sup>劉仁不負彭真所託，率領該區的城市工作部，成功地對北平地區進行滲透。林彪在 1949 年初率領中共軍隊進入北平時，大加表揚北平地下工作的人多勢眾和傑出成績。<sup>㉖</sup>根據「文革」揭發資料的說法，劉仁出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二書記，乃是彭真提議並報請中共中央同意；彭真不但注意在北京市委內維護劉仁的領導威信與地位，也在中共中央上層內努力為之推銷、爭取地位。劉仁在 1956 年的中共「八大」中，選上中共中央委員會候補委員，並且名列前段（73 人中名列第 17），據稱即與彭真的從中活動有關。<sup>㉗</sup>

劉仁的工作能力和若干特質，也確實能承擔起北京市的常務工作，直接減輕彭真在首都的工作負擔，進而讓之可較無後顧之憂地處理中央事務。劉仁觀察入微，彭真

註 ⑳ 李海文、王燕玲，*世紀對話：憶新中國法制奠基人彭真*，頁 291。

註 ㉑ 中國大陸一名中共黨史研究者提供的資訊。北京，2014 年 8 月。

註 ㉒ 岳祥口述，熊根琪、楊洋整理，「在彭真同志身邊工作的歲月」，*百年潮*（北京），2012 年第 9 期，頁 48。

註 ㉓ 張鏞斧、陳度、冬春，「關懷航空航天事業」，彭真生平暨中共太原支部舊址紀念館主編，*照片裡的故事*（太原：彭真生平暨中共太原支部舊址紀念館，2012 年），頁 256。

註 ㉔ 一名大興縣的資深幹部就回憶：「因老領導的主要精力在中央書記處，但那也要一年安排幾次時間和區縣委書記們談談心。」王荷蔭，「彭真『請客』」，中共北京市委黨史研究室主編，*研究與憶往：北京市紀念彭真誕辰 110 週年文集*（北京：北京出版集團公司、北京出版社，2013 年），頁 379。

註 ㉕ 中共北京市委劉仁傳編寫組，*劉仁傳*（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年），頁 75。

註 ㉖ 中華人民共和國北京市檔案館藏，「林彪同志講詞」，檔號 001-006-00059，1949 年 2 月 4 日。

註 ㉗ 原北京市委機關毛澤東思想紅旗兵團，*大野心家、大陰謀家彭真罪惡史（1925-1966）*（北京：無出版者，1967 年），頁 21、23；原北京市委機關毛澤東思想紅旗戰鬥兵團，*彭真反革命修正主義集團二號頭目劉仁罪惡史（1927-1966）*（北京：無出版者，1967 年），頁 13。

就常以「你瞞不了他」評之；<sup>④</sup>劉仁注意反映實情，彭真曾向毛澤東表示：「劉仁反映的情況是比較真實的。」<sup>⑤</sup>彭真也時常囑咐身邊秘書要學習劉仁匯報「比較準確、比較實際」的優點。<sup>⑥</sup>此外，劉仁做事細膩、認真負責，彭真在北京市處理事情時，就常要劉仁先行研究擬議。<sup>⑦</sup>北京市涉及重大的政治批判時，劉仁通常會代表市委講話，讓彭真無須直接上陣，既避免尷尬也留有迴旋的餘地。

劉仁對彭真甚為尊重，但並非是無原則地服從，在對北京市的工作上，他也敢提出不同意見，對彭真相關的政治言行起到把關、以至糾錯的作用。譬如：1958年8月，為鼓動北京市的「大躍進」運動，市委在天壇召開動員大會。在當時熱烈的政治氣氛下，彭真在會上帶頭吹起「浮誇風」，不但要求北京市郊區實行深翻土和密植，更鼓吹生產高指標，指示畝產小麥要上達數千斤（當時畝產僅約二、三百斤）。在外地的劉仁聞知後，即向彭真表示其指示脫離實際。彭真也有雅量地接納劉仁的意見。不久，北京市委即向下要求各地根據自身的實際情況，重新訂定生產指標。<sup>⑧</sup>

對於彭真和劉仁之間的配合得宜，1964年出任北京市副市長的崔月犁後來回憶：「當時彭真同志比較忙，主要抓方針政策方面的大事，與他（劉仁）這麼一個抓實際的人配合，北京的工作搞得在全國是數一數二的。」<sup>⑨</sup>

年紀較輕的鄭天翔，則是彭真在管理北京市時倚重的另一名助手。鄭天翔早年曾在晉察冀邊區工作，中共建政初期任職包頭市，在1952年底調入北京市委工作。彭真關心的首都工業發展工作，就由鄭天翔主管。彭真對鄭天翔的重視，可從其在使用他與萬里兩人的問題上有所反映。萬里在抗戰時期的晉冀魯豫邊區，即是鄧小平的部下，一直跟隨鄧到西南工作，後來上調中央。萬里在1958年被調入北京市之前，官拜國務院城市建設部部長。要如何安排他在北京市的地位與工作呢？在彭真的授意下，初來乍到的萬里在市委排名第四，居於彭真、劉仁、鄭天翔之後，負責政府和城市建設工作。彭真表示要先看其工作一段時間的表現後再作調動。<sup>⑩</sup>然而，至1960年代初市委黨代會換屆改選，鄭、萬位置先後的問題又再次浮現之時，彭真仍然繼續主張將鄭擺在萬之前。<sup>⑪</sup>1960年代中期，劉仁請假養病，北京市委的日常工作也由鄭天翔主持。

註④ 劉光人，「劉仁的人格力量」，劉光人主編，永遠難忘劉仁同志，頁75。

註⑤ 王漢斌口述、韓勤英整理，「在彭真身邊工作25年的片段回憶」，中共黨史研究（北京），2012年第10期，頁70。

註⑥ 項淳一，「我給彭真當秘書」，彭真生平暨中共太原支部舊址紀念館主編，照片裡的故事（太原：彭真生平暨中共太原支部舊址紀念館，2012年），頁203。

註⑦ 例如：1956年9月21日，北京市委青年團就市委領導人計畫招待外賓一事，致信請示彭真。彭真閱後直接批示：「請劉仁同志先研究」。中華人民共和國北京市檔案館藏，「市委負責同志招待『八大』外賓和國慶觀禮外賓遊園晚會計畫、參加人名單」，檔號001-006-01157，1956年9月21日。

註⑧ 李海文、王燕玲，世紀對話：憶新中國法制奠基人彭真，頁301。

註⑨ 崔月犁，「回憶劉仁同志」，徐書麟主編，月犁：崔月犁自述及紀念文章（北京：中國中醫藥出版社，2002年），頁165。

註⑩ 李海文，「專訪李雪峰：我所知道的文革發動內情」，共識網，<http://www.21ccom.net/plus/wapview.php?aid=99640>。

註⑪ 中國大陸一名中共黨史研究者提供的資訊。北京，2011年8月。

另外，鄭天翔在「文革」前被中共中央組織部選作「新生力量」的「標兵」，亦即是要精心培養的重點對象。<sup>②</sup>彭真在中央分管組織工作，鄭天翔被推選雖不一定是由彭真直接推薦，但過目、經手此事的彭真，也「內舉不避親」。彭真在鄭天翔、萬里之間的親疏有別，也可以在 1966 年彭真倒台後鄭天翔即隨之下馬，但是萬里卻能一度繼續留任在改組後的新北京市委上看出。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鄧拓。鄧拓是彭真在晉察冀邊區的舊屬，當時即負責宣傳工作。彭真入主北京市委後，鄧拓出任宣傳部長，也擔任彭真個人直轄的幕僚機構—市委政策研究室的主任。彭真很關心鄧拓的安全和工作，甚至曾住在一起並經常商議討論。<sup>③</sup>鄧拓後來調任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的總編輯、社長。1957 年，毛澤東認為〈人民日報〉在推行「百家爭鳴、百花齊放」政策上，反應遲緩、動作消極，嚴斥鄧拓是「死人辦報」，使之難以繼續在該報立足。彭真在 1958 年將鄧拓安排在北京市委，主管宣傳文教工作，並交付他籌辦市委的理論刊物〈前線〉。彭真表示：「鄧拓來了就好辦了。」<sup>④</sup>可見彭真對鄧拓的器重。事實上，在北京市重要文件和對外電報的起草上，彭真經常請鄧拓把關、甚至代筆。<sup>⑤</sup>

對於北京市重要的領導職位人事，彭真一言九鼎，握有決定權；對其下的職位工作安排，更是不在話下。<sup>⑥</sup>彭真在北京市的用人情形，在「文革」中受到嚴厲的批判，被指責為「招降納叛，結黨營私」，特別是批判他只用自身過去的老部下或是從晉察冀出身的幹部。針對此一指控，持相反意見者則認為：彭真倚重相關的人士與勢力，是一個自然產生的結果。一、因為彭真急於投入、開展工作，首先使用自己較為熟悉的幹部與下屬，由於對他們長短甚為明瞭，可以適切安排其職務。二、彭真所領導的市委團隊中，有不少早年服務於劉仁領導的城市工作部，對於北京當地情況與需要，也確實較易進入狀況、適任上手。此外，彭真在市委重用的幹部中，也有與之沒有共同的歷史淵源者，例如：早年在晉綏地區活動、「文革」前擔任市委宣傳部部長的李琪。<sup>⑦</sup>

註② 中央組織部〈只爭朝夕〉戰鬥隊，「鄧小平與安子文的黑關係一百條」，北京地質學院革命委員會、紅代會北京地質學院〈東方紅〉公社資料組主編，把鄧小平批倒鬥臭（北京：無出版者，1967 年），頁 26。

註③ 張成林，「難忘的三年」，晉察冀日報史研究會主編，人民新聞家鄧拓（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年），頁 394。

註④ 李筠，「〈前線〉創刊的前前後後」，中共北京市委黨史研究室主編，彭真在北京（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 年），頁 58-59。

註⑤ 例如：1959 年中共盛大慶祝十年國慶，其他社會主義國家首都如蘇聯莫斯科、保加利亞索非亞、北越河內、蒙古烏蘭巴托、捷克布拉格，以及匈牙利布達佩斯等市領導人，紛紛致電彭真和北京市祝賀。彭真的覆電稿就統由鄧拓審定。鄧拓閱後寫下「可用」，彭真見後批寫「發」，亦即同意按之發出。中華人民共和國北京市檔案館藏，「市負責同志及市級其他單位在我建國 10 週年與各國來往賀電、賀信」，檔號 102-001-00050，1959 年 10 月 6 日。

註⑥ 作家蕭軍因作品被批判感到不快，自學中醫，希望開業看診。在彭真指示下，北京市文化局將蕭軍安排到「戲曲研究所」擔任研究員。1984 年，彭真對此表示：「那時候，由我來主持北京市的工作，說話還算數吧！」王德芬，「彭真與蕭軍」，本書編輯組主編，緬懷彭真（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 年），頁 410-411、413。

註⑦ 中國大陸一名中共黨史研究者提供的觀察和分析。北京，2011 年 7 月。

## 陸、彭真何以在當地維持領導威信

在彭真擔任北京市的「一把手」期間，他在北京市的各級幹部中具有很高的領導威信，其號令一出，通常可以取得令到行止的效果。有些市委幹部在推行工作時，有時就想借用彭真的政治光環，便宜行事地號令群眾。對此，彭真曾提出告誡：「你們不要把我當『明星』，會開不下來，就把我抬出來。」<sup>⑤</sup> 1966年春，毛澤東決心打倒彭真，特意將批判彭真政治錯誤的文件轉發給北京市委的主要幹部，要後者勇於與彭真劃清界線、進而在揭發其錯誤中立功。出人意外地，北京市委的重要幹部竟表現出抵觸與抗拒的情緒。劉仁表示：「彭真同志在北京的工作中犯多大錯誤，我就犯多大錯誤。」<sup>⑥</sup> 李琪視彭真為知己，感念其知遇之恩，不平於彭真與北京市委的遭難，更以自殺表示抗議。<sup>⑦</sup> 由此可見，彭真治下有方，贏得許多下屬的忠心。探究彭真得以在北京市享有政治威信的原因，也可以反映出彭真當時的政治聲望，以及一些領導風格與個人特質。

一、彭真工作能力強，幹事精煉、效率高，能化繁為簡、直指重點，給人正面的領導形象。<sup>⑧</sup> 彭真的演說、表述能力強，可將抽象的政策以口語的方式表達，並針對不同的對象，用其熟悉的事物作譬喻。<sup>⑨</sup> 乾澀、枯燥的政治宣講，彭真能將之轉化成鼓動性甚強的演講。他沒有「官腔」的報告，很受北京市各級幹部的歡迎，每有不錯的反應。<sup>⑩</sup> 對於下級（包括高校畢業生）望其公開演說的要求，彭真也不視之為勞役，盡量滿足其需求。<sup>⑪</sup>

二、彭真會積極爭取、盡量照顧北京市的地方利益。彭真縱使中央事務繁忙，關於北京市的重大權益問題，他仍會加以關照。例如：北京市自中共建政後，被定位為

註⑤ 中共北京市委劉仁傳編寫組，劉仁傳，頁486。

註⑥ 中共北京市委劉仁傳編寫組，劉仁傳，頁522。

註⑦ 李莉，「憶李琪最後的日子和我的遭遇」，頁308。

註⑧ 崔月犁回憶：「彭真同志是雷厲風行的工作作風，幹事情乾脆利索，沒有拖泥帶水的情況，所以工作效率很高」；「彭真同志一開會就講，如何掌握政策，如何聯繫群眾，如何提出問題。彭真同志尤其不滿意的是講話沒有中心，大家在那時學會了抓住關鍵問題的所在。」崔月犁，「志趨不忘為人民——60年革命生涯自述」，頁41。

註⑨ 北京市的文教官員張文松回憶：「（彭真）講話時針對不同的說話對象用不同的語言，深入淺出，很有特點。」張文松口述、韓勤英整理，「我與彭真的君子之交」，中共北京市委黨史研究室主編，研究與憶往：北京市紀念彭真誕辰110週年文集（北京：北京出版集團公司、北京出版社，2013年），頁243。

註⑩ 李琦，「文藝小兵憶彭真」，本書編輯組主編，緬懷彭真（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頁419。

註⑪ 例如：1955年6月，北京大學的應屆畢業生寫信給彭真，表達「熱望在首都聽到敬愛的領袖們的親切指示」，「建議組織首都今年大學畢業生聯歡會，請黨中央負責同志講話」。彭真應允並指示北京高校黨委安排。中華人民共和國北京市檔案館藏，「彭真針對北大學要求聆聽演講對宋碩的指示」，檔號001-022-00146，1955年6月29日。

政治與文化中心，在經濟發展、特別是工業投資上，並沒有受到太多的照顧。北京市委亟欲利用「大躍進」之機，改變這種狀態。彭真予以支持，<sup>⑥</sup>並指示重大工廠盡快開工，先下手為強，造成既定的事實。<sup>⑦</sup>彭真也批示鬆綁過去限制在北京市城區中設置工廠的規定。<sup>⑧</sup>

另外，北京市作為一個大都市，擴建發展乃為長續經營的重要方法。1958 年北京市成功將其周邊的數個縣市合併，彭真強調如此「可以密切城鄉關係，加強城鄉聯繫」，避免「脫離了農民群眾」、「脫離了我們的基礎」。<sup>⑨</sup>此舉對北京市更實質的意義是，增加其城市發展的腹地和農副產品的供應基地。<sup>⑩</sup>1960 年代中期，彭真以備戰為名，欲進一步地將北京市擴大，甚至規劃向北將河北省軍事要地張家口納入。彭真在著手此事時，自行與軍方將領打招呼，卻未與 1960 年成立的中共中央華北局（李雪峰為首）做好溝通，造成後者的不快，此事最後不了了之。<sup>⑪</sup>

三、彭真會替北京市的工作進行辯護，對北京市的下屬幹部也多予愛護，如此博得後者的尊敬與愛戴。彭真頂上護下的具體案例可見：在檢討「大躍進」錯誤的 1962 年「七千人大會」中，北京市在安排加工生產問題上，被點名批評是不聽命中央號令的「分散主義」。彭真對此甚為不滿，直接跟持相關意見的中央領導人劉少奇、鄧小平當面力爭。<sup>⑫</sup>北京市委最後雖然在檢討報告中承認自身犯了「分散主義」的錯誤，但既有彭真帶頭表示異議，劉仁、鄭天翔、萬里私下對相關指控也多感不服。<sup>⑬</sup>

彭真照顧、保護下屬的例子，更是不勝枚舉。1960 年代中期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北京市郊區基層幹部與高校負責黨幹身陷批評的猛烈砲火中，作為他們上級的彭真設法為之解圍。最為人知的是，北京市副市長吳晗因撰寫發表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被黨內激進人士抓住不放，認為是為彭德懷「罷官」叫屈。彭真派人調查吳晗和

註⑥ 鄭天翔回憶：「劉仁和我都堅持北京要搞工業，要建成一個現代化工業城市。彭真同志贊成我們的意見，市委常委會多次通過了這個意見。」鄭天翔，「被顛倒的事實終被顛倒過來」，頁 7。

註⑦ 原北京市委毛澤東思想紅旗兵團，舊北京市委彭真反革命修正主義集團罪惡活動大事記（1949-1966）（北京：無出版者，1967 年），頁 23。

註⑧ 中華人民共和國北京市檔案館藏，「賈星五同志關於限制在城區內開設動力在三馬力以上工廠問題的處理經過向彭真同志的報告及彭真同志的批示」，檔號 002-010-00114，1958 年 3 月 11 日。

註⑨ 中華人民共和國北京市檔案館藏，「市委、市人委為通縣、大興、房山、良鄉、順義縣、通州市劃歸北京市領導與五縣一市領導同志座談交接工作問題的記錄，彭真同志講話和有關文件」，檔號 001-006-01327，1958 年 3 月 20 日。

註⑩ 陳靜、韓勤英整理，「他為人民、為黨無私奉獻——趙凡同志談彭真」，頁 444。

註⑪ 中國大陸一名中共黨史研究者提供的資訊。北京，2011 年 8 月。

註⑫ 張素華，變局：七千人大會始末（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6 年），頁 102-103。

註⑬ 對於北京市在「七千人大會」期間被批評犯有分散主義錯誤，劉仁在會後不滿地對新華社北京分社負責人表示：「用加工的方法搞材料，上海有的是，你們知不知道？為什麼不敢反映？」鄭天翔也憤憤不平地說：「這是專找岔子，非批評北京不行，其實別處比我們嚴重多了。」萬里亦在會後表示：「為什麼不早問一問下面，否則不至於鬧成這個樣子。」中共北京市委機關革命造反派徹底摧毀舊北京市委戰鬥兵團，舊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義集團頭目罪行錄（北京：無出版者，1967 年），頁 30、51、57。

彭德懷之間的關係，結果顯示兩人沒有瓜葛；彭真更親自爲此向毛澤東說明。<sup>③</sup>

1970年代初期，彭真的子女好不容易獲准可以對彭真進行探監。在大牢中飽受煎熬、已數年未見家人的彭真，還不忘對他們細問多名原市委幹部在「文革」中的遭遇和現況，反映其對市委部屬的念舊之情。<sup>④</sup>

然而，不可迴避的是：彭真在治京期間有時基於政治需要，特別是在政治運動的浪潮下，會選擇犧牲一些首都的中、低級幹部。1957年整風運動期間，彭真直接指示清華大學黨委領導不要捨不得「徒子徒孫」，亦即毅然拋出一些中共早期學生運動的幹部，將之打爲「右派」。<sup>⑤</sup>面對因1959年廬山會議轉向而發起的「反右傾」運動，彭真領導的北京市委爲了證明自身是堅決頂著「右傾歪風」，將率領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部分師生前赴河南、河北調查人民公社問題的北大副校長鄒魯風，打爲「右傾機會主義分子」。鄒魯風的相關調查行動和結果，彭真和北京市委原本都知悉並重視，事後竟佯裝不知，令鄒氏大感失望、憤而自殺。<sup>⑥</sup>

四、彭真在中央高層「一貫政治正確」的形象，以及有更上一層樓的政治前景，北京市委的各級幹部看在眼裡並實際受用，對之感到佩服，也寄予厚望。彭真在「文革」前的政治上，一向表現得與中共中央、尤其是與毛澤東立場一致；彭真在上層政治中也愈加火紅：他經常獲毛單獨召見；鄧小平亦每將中央書記處的工作託交給他處理。在中共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全國政治協商會議的「兩會」活動上，彭真皆擔任要職、甚是活躍。繼毛之後擔任全國「政協」主席的周恩來，甚至曾建議由彭真接任該職。<sup>⑦</sup>

彭真在中央佔有一席之地、參與黨國機要，其身邊的重要幹部可以較早聞得上層動向以至層峰態度，<sup>⑧</sup>因而在實際工作上，可以搶得政治機先；當來自中央上層的訊息模糊、矛盾，感到莫衷一是時，市委幹部也可透過彭真「探底」。<sup>⑨</sup>彭真有力的地位更是北京市對外交涉的關鍵憑藉。<sup>⑩</sup>爲此優勢和方便，劉仁和市委高幹一直堅決要求彭真留任在北京市的領導崗位上。鄭天翔後來被揭發甚至曾說過：「北京市就是靠吃彭真的這碗飯了」。尤有甚者，北京市的高、中級幹部將彭真視作毛澤東的重要助手、政治化

註③ 劉政，「彭真與『兩個平等』」，*秘書工作*（北京），2014年第11期，頁61。

註④ 中國大陸一名中共黨史研究者提供的資訊。北京，2013年7月。

註⑤ 鍾延麟，「彭真在1957年整風、『反右派』運動中的角色與作爲」，*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第26卷第2期（2014年6月），頁266。

註⑥ 鍾延麟，「彭真在1959年中共『反右傾』運動中的角色和作爲」，*中國大陸研究*，第57卷第1期（2014年3月），頁113-115。

註⑦ 鍾延麟，「周恩來與彭真關係之研究（1928-1976）」，*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2014年第42期，頁270-273、276-277。

註⑧ 崔月犁回憶：「一解放，我就在北京市委工作，經常能聽到毛主席的教導和談話，彭真同志工作非常緊張，參加中央政治局的會議，常常到很晚。彭真同志從中央開會一回來，就向大家傳達毛主席講了什麼了，三天兩頭可以聽到。」崔月犁，「志趨不忘爲人民—60年革命生涯自述」，頁42。

註⑨ 劉冰，「北京記憶」，頁214。

註⑩ 劉仁就曾表示：「彭真同志既是中央的書記處書記，又是北京的第一書記，只有請彭真同志去中央協調。」郝在今，「心情最好的日子—彭真的17年」，*報告文學*（北京），2002年第10期，頁18。

身，在「文革」中遭揭發的「出格」言語如有：「跟毛主席首先要跟彭真」、「彭真的意圖就是主席和中央的意圖」、「跟彭就是跟毛主席，我就是跟彭的」（鄭天翔）；<sup>⑧</sup>「在北京要緊跟毛澤東思想，首先就得緊跟彭真思想」（鄧拓）。甚至更傳出了彭真是「毛主席的接班人」的說法。<sup>⑨</sup>

在中共封閉的政治體制中，上級與下級之間政治庇應、扈從關係普遍存在，兩者共榮共損。彭真在政治上的發達，對其首都下屬與幹部而言，除了是一種政治保障，也是未來政治升遷的一大助力。與此同時，彭真在市委的心腹幹部，對於彭真在上層的人事往來和恩怨，都甚為清楚。<sup>⑩</sup>因為這會直接影響彭真個人來日的政治高升，他們自身的仕途也會受到羈絆和波及。後來隨著彭真政治崩盤後，北京市委有十餘名幹部遭受牢獄之災，家屬也多受連坐之殃。<sup>⑪</sup>

## 柒、首都工作對彭真的政治加分

1950 年代中期以後，彭真已身兼多項中央要職與工作，但他並沒有將北京市的職務和事業看作是可有可無的「政治雞肋」。因為首都的工作和成績，讓彭真在政治上獲益許多、增色不少。

### 一、增強毛澤東對彭真的政治好感和信任

彭真管理北京市，承受很大的政治壓力，因為直接受到中共中央、尤其是毛澤東的關注。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對於彭真在北京市的工作，不乏有直接而嚴厲的批評。例如：「大躍進」初期，北京市委忙於大煉鋼鐵和工業建設，忽略副食品和蔬菜的生產，導致首都出現供應緊張、居民生活不便的窘況。毛聞知後不滿地表示：「如果搞不到這些東西，不如請蔣介石回來。」<sup>⑫</sup>彭真和市委不得不檢討並亟思解決方案。<sup>⑬</sup>另一例可見：前文提及的彭真藉「大躍進」之機擴建的北京鋼廠，出現連年虧損、國家投資幾近賠光的情況。1962 年 2 月 26 日，劉少奇聞知後要彭真、劉仁處理，更直指：「國營工廠如果照這樣辦下去，結果會怎樣呢？難道不會亡國嗎？」<sup>⑭</sup>

註 ⑧ 中共北京市委機關革命造反派徹底摧毀舊北京市委戰鬥兵團，舊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義集團頭目罪行錄，頁 53~54。

註 ⑨ 原北京市委、市人委機關摧舊兵團編印、北京市革命委員會政治組宣傳小組翻印，砸爛彭真的反革命黑綱領：揭發批判彭真精心炮製和全面推行〈前線〉發刊詞的滔天罪行，頁 45~46。

註 ⑩ 李莉，「憶李琪最後的日子和我的遭遇」，頁 299。

註 ⑪ 崔月犁，「志趨不忘為人民—60 年革命生涯自述」，頁 69。

註 ⑫ 中華人民共和國北京市檔案館藏，「李先念同志在全國大、中城市副食品和手工業品生產會議上的講話要點」，檔號 002-011-00103，1959 年 6 月 23 日。

註 ⑬ 中共北京市委劉仁傳編寫組，劉仁傳，頁 336。鄭天翔對此回憶：「1958 年，我們忙於大辦鋼鐵和別的事，忽視了抓蔬菜，結果蔬菜供應很困難。對此，毛主席也批評了。我們檢討了這個很大的失誤，1959 年就下大力抓菜。」鄭天翔，回憶北京 17 年，頁 16~17。

註 ⑭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劉少奇年譜（1898-1969）（下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 年），頁 549~550。

但是彭真在北京市的政治作為和表現，也比較容易進入中共中央、特別是毛澤東的視線範圍內，進而獲得好評。1960 年代初的經濟調整時期，彭真在北京市郊區禁止實行包產到戶的嚴明立場，就讓毛澤東甚為欣賞。<sup>88</sup>事實上，自此直到「文革」爆發前的兩、三年內，毛澤東接連贊揚彭真領導下的北京市。1963 年冬，毛澤東要妻子江青赴北京市學習並在該地從事京劇改革。<sup>89</sup>1964 年 7 月和 1965 年 9 月，毛兩度稱讚彭真領導的北京市「工作做得不錯」。<sup>90</sup>彭真在 1960 年代前半期獲得毛澤東的榮寵和重用，他所管的首都工作有成並成功步入毛的眼簾，是一個過去相關研究文獻較少注意的重要因素。

## 二、增進彭真在中共政治中的實質地位和影響力

彭真在中共中央分工負責政法、統戰和組織工作，因為他對相關事務的直接掌握和嫻熟，使之自然在這些政策領域中享有關鍵的地位。實際上，治理北京市也為彭真在中央若干決策和施政過程中，另外增添了一些特殊的發言權和影響力。

例如：北京市乃是中國大陸的文教中心，中小學普遍設立外，更群集了重要的高等教育學校。北京市高校的政治運動經驗和管理做法，包括：1957 年高校黨內「反右派」、1958 年初高校整風「補課」、1959 年北京高校反對「黨員專家」，以及 1963 年北京高校嚴管「反動學生」等。彭真即很注意總結和整理，並上呈中共中央參考。由於彭真本身在中央內的重要地位，他有時甚至會直接建議中共中央和毛澤東以中央的名義，同意、批轉北京市校園的相關經驗和辦法，讓之成為全國其他各地教育機構學習和模仿的對象。<sup>91</sup>經過上述的政治過程，彭真在北京市文教部門的政治管理經驗，就升格具有全國的意義和影響力。

積極尋找、創造北京市先進的工作經驗和典型，向中央推薦並獲之認可後，對北京市以外的地區進行推廣、要求仿照，彭真在這方面有旺盛的企圖心。針對北京市作為大城市的特性，在中共對城市地區的各项政策與工作中，例如：工業化建設、城市規劃與市政建設、工廠企業管理、基層政權管理，以及與城市較有直接關係的機構和人口精簡、商業問題、文化教育政策、資產階級政策等。彭真希望其麾下的北京市，能積極作為中國大陸其他大、小城市的表率。

以商業問題來說，在彭真親自領導下，北京市將天橋百貨商場樹立為「紅旗」單位。彭真不僅希望此一典型能帶動北京市內其他商業單位的進步，更期望走出首都、睥睨全國。「文革」中，對於彭真這方面的政治企圖，有詳細的揭發，言其曾說：「中央要抓商業工作，你們要趕緊行動，要走在全國前面。」「這個點只許搞好，不許搞

註 88 劉政、張春生，「從歷史的幾個重大關節看彭真和毛澤東的關係」，*領導者*（香港），2013 年第 51 期，頁 152。

註 89 李海文、王燕玲，*世紀對話：憶新中國法制奠基人彭真*，頁 302。

註 90 中共北京市委劉仁傳編寫組，*劉仁傳*，頁 515。

註 91 鍾延麟，「彭真在 1957 年整風、『反右派』運動中的角色與作為」，頁 263-267、270-271；鍾延麟，「彭真在 1959 年中共『反右傾』運動中的角色和作為」，頁 116-117。

壞。這個點搞好了，也就突出了北京。」<sup>92</sup>事實上，彭真也不吝在各省官員齊聚開會時推銷天橋經驗，稱之商業改革的典型。<sup>93</sup>

鑑於北京和上海兩個「龍頭」城市的引領地位，在 1958 年，中共中央還指定彭真和上海市領導人柯慶施，每年負責召集國內其他重要城市領導人舉行聯席會議、交流經驗。<sup>94</sup>

彭真也期望北京市進一步地在城市工作與政策之外的若干重要議題，舉如在城鄉關係、工農關係，以及農業生產上，亦可有所斬獲、甚至對以農業為主的省份地區反向推銷。彭真就委託鄧拓監製題為「北京農業大躍進」的紀錄片，旨在介紹、宣傳北京市郊的農業發展經驗。製成後，彭真親自予以審查並表示滿意。<sup>95</sup>此一影片至少曾在福建、浙江等地播放。彭真不但知情，也關注其反響。<sup>96</sup>

彭真在北京市的一些政策努力，譬如：在 1959 年底，彭真嘗試將北京郊區一些農村人民公社從集體所有制轉變成全民所有制，欲以此做出成績讓毛澤東接受公社應「早過渡」、「窮過渡」的主張，以及他在 1960 年初積極籌建城市人民公社，並迅速總結相關經驗報呈中央爭作楷模。皆猶如曇花一現，最終以失敗告終。<sup>97</sup>但總體來說，彭真領導下的北京市的工作，在「文革」前受到各方的肯定，包括：獲得全國人大代表工作視察組的褒獎，<sup>98</sup>以及其他地方領導人的讚賞。<sup>99</sup>

### 三、增加彭真的政治曝光率和知名度

「文革」前中共的慶典活動與對外關係上，北京市皆享有特殊的地位。領導北京市的彭真，也因此頻頻亮相、出盡風頭。中共的「五一」勞動節、「十一」國慶日活動，係由中央政府與北京市合辦，但具體工作由後者承辦。彭真對此項工作很重視，

註 92 李海文、王燕玲，*世紀對話：憶新中國法制奠基人彭真*，頁 289；原北京市委機關毛澤東思想紅旗兵團，*大野心家、大陰謀家彭真罪惡史（1925~1966）*，頁 39。

註 93 彭真傳編寫組編，*彭真年譜（第 3 卷）*，頁 287。

註 94 彭真傳編寫組編，*彭真年譜（第 3 卷）*，頁 311。

註 95 「從〈北京農業大躍進〉看舊北京市委的狼子野心」，*電影批判（北京）*，1967 年 5 月，第 4 版；文化部機關革命戰鬥組織聯絡站編，*徹底清算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彭真在文化方面犯下的滔天罪行（北京：無出版者，1967 年）*，頁 4。

註 96 彭真傳編寫組編，*彭真年譜（第 4 卷）*，頁 458。

註 97 Yen-Lin Chung, "The Unknown Standard-Bearer of the Three Red Banners: Peng Zhen's Roles in the Great Leap Forward," *The China Journal*, No. 74 (July 2015), pp. 137-141.

註 98 中華人民共和國北京市檔案館藏，「全國人大代表王維舟等 9 人在京視察工作的報告」，檔號 002-012-00197，1960 年 7 月 1 日。

註 99 河北省委第一書記林鐵，在「文革」中遭其秘書揭發，指稱其對北京市的經驗甚為崇拜。老鬼，*胡開明（香港：新世紀出版及傳媒有限公司，2013 年）*，頁 244-245。另外，根據「文革」的揭發資料，1965 年秋，中南局書記處書記李一清到北京時，積極求見彭真，後者後來在家裏接見他。同時，李氏也見到鄭天翔，表示要「請他介紹北京市委的領導工作經驗」，並多次稱讚「北京市的工作抓得好」。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揭發批判陶鑄聯絡委員會，*井岡山批陶專輯（北京：無出版者，1967 年）*，頁 19。

主張組織「排山倒海」的遊行場面，認為如此「對帝國主義是一個大示威，顯示了我們的力量，對資本主義國家是一個影響。」<sup>⑩</sup>在「十一」活動正式登場以前，彭真都要親自檢閱和驗收。<sup>⑪</sup>1959年中共的十年國慶大典，就是由彭真統籌負責。其中展示的壯觀場面，引起外媒的高度重視，認為是中共國力的強力展現。<sup>⑫</sup>彭真在相關場合中，擔任司儀工作，如同東道主。毛澤東現身典禮會場時，彭真隨侍在旁，也成為鎂光燈的焦點。毛澤東對彭真和北京市委在這方面的工作，頗為滿意。<sup>⑬</sup>

北京市經常從事首都外交和城市外交的活動，其履行相關任務時，即常以彭真的名義行之，彭也樂於為之、親予掌握。彭真也會要求用市長之名對外送禮、做公關。彭真自身明白北京市相關職務為他提供的政治方便和宣傳效果。根據彭真親信在「文革」中對之的揭發，彭真曾表示：「市長可活動範圍廣，國際、國內，這個不能不當。」<sup>⑭</sup>國民黨的「匪情研究」也認為彭真長期留任中共首都領導職位，乃持有這種政治盤算。<sup>⑮</sup>

因為彭真在中共相關儀式活動中慣常出席，使之成為直接反映他政治起伏的溫度計。1966年的「五一」官方活動中，每年的固定主持者彭真沒有如昔出席，市委幹部大表意外、預感不妙。<sup>⑯</sup>

## 捌、彭真和市委為何遭控為「獨立王國」

1966年4月，毛澤東嚴厲批判「北京市一根針也插不進去，一滴水也潑不進去」。<sup>⑰</sup>把首都變成唯我獨尊、不讓他人置喙的「獨立王國」，成為彭真政治出局的一

註⑩ 洪長泰，*地標：北京的空間政治*（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1年），頁229-230。

註⑪ 李海文、王燕玲，「秘書張道一談彭真與毛澤東 1963年後的關係」，人民網，<http://www.people.com.cn/GB/shizheng/252/9114/9116/20020929/834027.html>。

註⑫ 「外國資產階級報刊通訊社對我慶祝建國10週年的反應」，*內部參考*（北京），1959年第2899期，頁16-17。

註⑬ 曹綺雯，「魂繫戰友憶宋碩」，*懷念宋碩同志編寫組主編，懷念宋碩同志*（北京：北京工業大學出版社，1991年），頁141-142。

註⑭ 原北京市委機關毛澤東思想紅旗兵團，*大野心家、大陰謀家彭真罪惡史（1925-1966）*，頁19。

註⑮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第六組編印，*彭真反毛集團*（台北：無出版者，1968年），頁21-22。其中分析：「彭真之所以要長久（自40年起）擔任偽『北京市長』及匪黨北京市委第一書（記自38年起）這是因為北平為共匪政權偽都，各項全國性紀念性活動、慶典、政治聲援、接待國際重要人士等，均以北平馬首是瞻。彭真任此位置，兼顧中央與地方，亦表示其地位、聲望可以配合，歷年偽國慶紀念，重要紀念日，在政治上聲援以滲透顛覆為實質的『民族解放運動』等，照例由彭真主持，並且常代表共匪做政策性談話。」

註⑯ 張大中，*我經歷的北平地下黨*（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9年），頁297-298；李莉，「憶李琪最後的日子和我的遭遇」，頁294。

註⑰ 彭真傳編寫組編，*彭真年譜*（第4卷），頁484。

項口實和原因。⑩這一政治指控，在若干程度上，也反映了累積一段時日、捲入多項議題下緊繃的中央和地方（北京市委）關係。北京市是中共中央領導人、中央黨政軍部門，以及各種政治勢力群聚之地。彭真及其領導的市委與之相處繁多。然而，在彼此互動的過程中，有時因各自政治偏好的殊異、考量重點的歧異而出現紛爭、陷入緊張。這在「文革」前夕越益頻繁地發生，甚而對彭真在中央的政治地位產生嚴重不利的影響。

由於彭真自身在中央的地位非同一般，當他下轄的市委和中央部門互動，彭真就表現得直來直往、不甚客氣。例如：關於市委的〈北京日報〉在揭露弊端、報導新聞的範圍問題，彭真即直言：「市的機關要管，中央機關也要管，你是北京的戶口，土地屬我管。」⑪北京市在推行衛生運動時，一些中央部門不讓基層街道人員進門檢查。彭真聞後馬上召集各中央部門和軍隊各總部負責人到市委開會，要求對方配合。⑫

另外，關於北京市高校的領導問題，北京市委負責領導其黨務工作，中共中央宣傳部則負責領導其政務工作。但在實際運作中，雙方管理界線難分，容易出現僵持的狀況。例如：1962年中宣部派調查組進駐中國人民大學，檢查校黨委書記胡錫奎的工作。但由於北京市委不買賬，中宣部主導的調查組也無可奈何。⑬人大校長吳玉章不滿胡錫奎久矣，欲直接找彭真反映問題。彭真先是迴避吳的求見，見面後對之也敷衍應付。⑭直到1963年鄧小平出面表態批評人大工作、指出可以調離負責人後，該校黨委才得以進行改組，胡錫奎最後被調去西北局工作。面對彭真如此強勢的「地頭蛇」，中央衙門官員多少感到有些不是滋味。

1960年代初經濟情勢步入穩定之後，毛澤東關心和提出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戲劇改革、文藝批評和革新等任務。因為這些事務皆屬內容模糊不清的意識形態性質問題，需要進行政策探索、累積經驗和填充內容。彭真領導的北京市有地近之便，市委的一般幹部素質又較好；⑮再加上，該市的若干特點，如是知識文教界的集中地。故常是中央相關人士與部門試行前述政策倡議的地點。

對於毛澤東的相關政策號召，彭真在北京市積極地表態支持。然而，當彭真和市委協助中央「來人」在京畿地區推行政策、檢討問題及評價人事時，由於對北京市的人員與工作，平素有更密切的關係與連繫，在施壓力度與幅度上較為節制，亦會抱以

註⑩ 彭真在1966年政治出局，牽涉到多方面的原因，包括：中央高層複雜的人事關係和權力鬥爭。初步的探討請見：鍾延麟，「周恩來與彭真關係之研究（1928-1976）」，頁279-280。此處著重強調、凸顯彭真身處北京市領導人的位置，如何令之較易陷入政治交鋒和漩渦。

註⑪ 中華人民共和國北京市檔案館藏，「彭真同志在討論北京日報工作會議上的講話紀要」，檔號001-006-00655，1952年10月16日。

註⑫ 同註⑪。

註⑬ 耿化敏，*何幹之傳*（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12年），頁243-248。

註⑭ 郭影秋口述、王俊義整理，*往事漫憶：郭影秋回憶錄*（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年），頁218-219。

註⑮ 崔月犁針對北京市委的幹部水平表示：「因為離中央近，一般來講，也是相當不錯的。」崔月犁，「回憶劉仁同志」，頁165。

比較理解、同情的態度。保持市委轄區的政治平穩與生產穩定，也是彭真不同於這些「客人」的一個重要考量。彭真對自身首都治理工作滿意、自豪，並當作是自己事功的重要組成部分，對於他者對首都工作與人事的過度批評與大力挑剔，自也難以忍耐與坐視。

在京劇改革問題上，彭真對江青主張顛覆大改的修正意見，以及她頤指氣使的態度，忍無可忍，兩人勢如水火。<sup>⑭</sup>在農村社教問題上，彭真對毛澤東的「筆桿子」陳伯達在北京郊區的激烈作法有所保留，以及彭真在北京市當家，因而在後來的運動走向中更強調提振幹部士氣、促進農業生產的重要性；<sup>⑮</sup>在北京大學社教問題上，彭真出面保護北大以陸平為首的黨委，不接受中央宣傳部與運動積極分子的揭發成果，以免市內以至他地的其他高校，因北大運動激化可能產生的骨牌效應而接連傾倒。<sup>⑯</sup>受毛澤東重視的意識形態顧問康生，對此則有不同的看法。<sup>⑰</sup>

彭真在以上問題中主動或被動表現出來的守成傾向與守護形象，從對現狀不甚滿意、個性多疑又易怒的毛澤東看來，只有減分的效果；更不利的是，在這一程中，那些和彭真爆發衝突的個別人士如江青、陳伯達、康生又多可「通天」。他們以切身同彭真打交道的負面體驗向毛澤東「告御狀」、說彭真在北京市「搞獨立王國」，愈益減損毛澤東對彭真的好感與信任。<sup>⑱</sup>最後，在批判吳晗的問題上，毛澤東原本期望以之為擴大文藝整頓的突破口，並向彭真「打招呼」、要其配合，但他卻覺得：吳晗自恃受到彭真的了解而頑抗不靈；彭真對批吳先是觀望不前，繼而走一步算一步，不想擴大事端，甚而出手限縮。<sup>⑲</sup>

綜上種種，毛澤東以為彭真領銜的首都市委已不像過去般如臂使指，反倒成為絆腳頑石。1966年4月底，毛澤東在中共中央上層指示要對彭真的錯誤「徹底攻」，彭真政治落馬已成定局。5月4日，彭真也識趣地向劉少奇、鄧小平提出不管北京市的工作。<sup>⑳</sup>

註⑭ 當時參與戲劇創作的人員回憶，江青氣言：「叫老子在這裡試驗，老子就在這裡試驗。不叫老子在這裡試驗，老子到別處試驗！」彭真一見江青在場，也扭頭就走。陳徒手，人有病天知否：1949年後中國文壇紀實，修訂版（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3年），頁407-409、419。

註⑮ 趙凡，憶征程（北京：中國農業出版社，2003年），頁179-188；張大中，我經歷的北平地下黨，頁296-297。

註⑯ 彭珮雲、廖叔俊，「追述彭真關懷北京高等教育的光輝思想和實踐」，彭真生平思想研究編輯組主編，彭真生平思想研究（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年），頁349-353。

註⑰ 宋碩是協助彭真處理北京市高校工作的市委幹部。他表示：「北大社教彭真和康生有分歧，這是事實。」朱光熹，「宋碩在『全國第一張大字報』出籠前後」，懷念宋碩同志編寫組主編，懷念宋碩同志（北京：北京工業大學出版社，1991年），頁37。

註⑱ 劉政、張春生，「從歷史的幾個重大關節看彭真和毛澤東的關係」，頁154-155；趙有福，北京通縣地區的『四清』運動（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9年），頁165-166。

註⑲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頁1398-1403。

註⑳ 彭真傳編寫組編，彭真年譜（第4卷），頁484。

## 玖、結 論

從中共建政直至「文革」爆發以前，中共首都北京市皆在彭真的領導之下。其任職時間之長，在「文革」前所有的中共省市首長中，少有人可與之相提並論。彭真在中央的重要地位，讓其北京市職位的影響益加上揚，進而成為最具發言權的地方領導人之一；彭真在北京市崗位上積極奮發、屢創佳績，令之在中央議事時，有所憑據、如虎添翼。「文革」前中共地方黨委經常發生的內鬨和政爭，並未在北京市出現。彭真御下有術、可以服眾，北京市委團結在他之下。彭真在北京市巍然難動，招致非議，更引起、加重毛澤東的疑心，終而被迫離職。

彭真在「文革」後重新政治「出山」，又再次成為「黨和國家的領導人」，負責主持全國的政法工作和人民代表大會的制度建設，不再管理北京市的工作。然而，彭真在「文革」前長期擔任「京官」的經歷，使之對北京市的工作仍有不可忽視的影響力。國務院總理趙紫陽就曾表示，擔任北京市長不容易，必須勤走多方、與之周旋。其中，彭真就是一個必須要打交道的重要對象。<sup>⑩</sup>

進入「改革開放」時期後，北京市的重要領導幹部中，有不少人在「文革」前會直接或間接受彭真的領導和培育，又共同經歷「文革」迫害而有「共患難」之感，因此對彭真甚為敬重，視之為「德高望重的革命家」。<sup>⑪</sup>從 1983 年起長期擔任北京市長（同時身兼市委主要領導職位）的陳希同，「文革」前曾任劉仁秘書並在北京基層工作。出於對「老領導」的尊敬，陳希同逢年過節時會探望彭真，<sup>⑫</sup>有時也會陪之視察市政建設。<sup>⑬</sup>彭真在 1987 年曾公開讚揚陳希同：「你這個市長比我那個市長當得好啣！」<sup>⑭</sup>

彭真在「文革」前長期任職北京市，也讓之在「改革開放」時期得擁有一支重要的人事隊伍，影響所及超出北京市的工作和範圍。彭真在 1980 年代主持中共法制建設和人大相關工作時，主要使用他在兩方面累積的歷史人脈：一是「文革」前彭真在中央分管政法工作時，認識、栽培的政法系統幹部；另一就是通過「文革」政治考驗的

註⑩ 楊繼繩，楊繼繩：中國當代名人政要訪談述評集（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13 年），頁 165。

註⑪ 〈短句憶行程〉編輯組，聽媽媽講那過去的事情——紀念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60 週年（北京：無出版者，2009 年），頁 101。

註⑫ 姚監復，陳希同親述—眾口鑠金難鑠真（香港：新世紀出版及傳媒有限公司，2012 年），頁 48、171~172。

註⑬ 李尚志，「彭真視察北京新建築、新工程，希望北京市進一步解放思想、搞好改革、尊重科學，精心規劃和指導，把首都建設得更加美好」，人民日報（北京），1985 年 1 月 2 日，第 1 版；張文奇，「共產黨員不能糊塗——回憶彭真同志對我的教誨」，人民網，<http://www.people.com.cn/GB/paper83/3618/448900.html>。

註⑭ 「置身於代表之中——彭真委員長在北京代表團」，人民日報（北京），1987 年 4 月 5 日，第 2 版。

原北京市委的幹部。⑩較突出的案例如：鄭天翔出任最高法院院長；「文革」前擔任北京市委副秘書長的王漢斌、市委工業基建委員會主任的宋汝棼，在全國人大中作為彭真的重要助手。「文革」前曾擔任北京市常務副市長、協助彭真管理市政府工作十年的張友漁，其研究法學的專長，此時也獲彭真借重。原出身於北京市委、位階在鄭、王、宋之下的中堅幹部，人數就更多了。這或因為彭真對他們較為熟悉，明白其素質、才幹和忠貞，乃是可襄助自身開創政治事業「第二春」的左臂右膀。

\* \* \*

(收件：104年3月9日，接受：104年6月25日)

---

註⑩ 是否在「文革」政治壓力中仍站穩立場，乃是彭真後來甄選使用原北京市委幹部的重要標準。彭真認為：市委常委、副秘書長項子明在「文革」中對之不忠，甚而出賣、構陷。1984年，本來代理北京大學黨委書記的項子明，原定要真除此一職位，但在彭真的強力反對下，相關人事任命終而流產。丁石孫口述，袁向東、郭金海整理，「我在北大當校長」，*炎黃春秋*（北京），2013年第10期，頁13-14。

# Peng Zhen and the PRC's Capital Governance before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Political Principles, Leadership Style and Cadre Policy

*Yen-Lin Chung*

Assistant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 Abstract

As one of the most influential central leader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eng Zhen concurrently served as the top leader of the capital, Beijing Municipality, from late 1948 to early 1966. Peng governed the capital for such a long time because the Party Center led by Mao Zedong appreciated his loyalty and ability demonstrated in leading the important city. In fact, Peng spared no effort to toe the Party Center's line at any cost and cement the capital's role as the nation's model. Regarding capital governance, in order to save more time and energy to deal with central affairs, Peng usually focused only on major and crucial issues, and assigned follow-up management and implementation to his trusted deputies and efficient officials. Due to Peng's outstanding leadership, bright career future and his strong inclination to take care of subordinates and local interests, he successfully enjoyed a high prestige in Beijing, and eventually cultivated a strong personal network there. On the one hand, Peng's effective rule in Beijing strengthened his political status and influence in the central politics, and on the other hand, it unfortunately incurred suspicion and hostility of other Party politicians. Against the background, Mao in 1966 harshly criticized Peng for making Beijing his own "independent kingdom," and removed him from his post as a Party boss of the capital.

After the end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Peng did not return to his old task. However, he still exerted great influences over local politics in Beijing. More importantly, while leading the PRC's legal system in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period, apparently, Peng relied heavily on his old subordinates in Beijing from the pre-Cultural Revolution period.

**Keywords:** Peng Zhen, Beijing Municipality, Political Governance, Chinese Communist Politics

### 參考文獻

- 「外國資產階級報刊通訊社對我慶祝建國 10 週年的反應」，內部參考（北京），1959 年第 2899 期，頁 15~18。
- 「從〈北京農業大躍進〉看舊北京市委的狼子野心」，電影批判（北京），1967 年 5 月，第 4 版。
- 「置身於代表之中——彭真委員長在北京代表團」，人民日報（北京），1987 年 4 月 5 日，第 2 版。
- 丁石孫口述，袁向東、郭金海整理，「我在北大當校長」，炎黃春秋（北京），2013 年第 10 期，頁 13~20。
-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劉少奇年譜（1898-1969）（下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 年）。
-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 年）。
- 中共北京市委劉仁傳編寫組，劉仁傳（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年）。
- 中共北京市委機關革命造反派徹底摧毀舊北京市委戰鬥兵團，舊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義集團頭目罪行錄（北京：無出版者，1967 年）。
- 中共北京市委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北京歷史大事記（1949-1978）（北京：北京出版社，2001 年）。
- 中央組織部〈只爭朝夕〉戰鬥隊，「鄧小平與安子文的黑關係一百條」，北京地質學院革命委員會、紅代會北京地質學院〈東方紅〉公社資料組主編，把鄧小平批倒鬥臭（北京：無出版者，1967 年），頁 18~30。
-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第六組編印，彭真反毛集團（台北：無出版者，1968 年）。
- 王荷蔭，「彭真『請客』」，中共北京市委黨史研究室主編，研究與憶往：北京市紀念彭真誕辰 110 週年文集（北京：北京出版集團公司、北京出版社，2013 年），頁 379。
- 王德芬，「彭真與蕭軍」，本書編輯組主編，緬懷彭真（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 年），頁 404~417。
- 王漢斌口述、韓勤英整理，「在彭真身邊工作 25 年的片段回憶」，中共黨史研究（北京），2012 年第 10 期，頁 68~73。
- 文化部機關革命戰鬥組織聯絡站編，徹底清算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彭真在文化方面犯下的滔天罪行（北京：無出版者，1967 年）。
- 朱光熹，「宋碩在『全國第一張大字報』出籠前後」，懷念宋碩同志編寫組主編，懷念宋碩同志（北京：北京工業大學出版社，1991 年），頁 27~43。
- 老鬼，胡開明（香港：新世紀出版及傳媒有限公司，2013 年）。
- 宋汝芬，「『文革』瑣憶」，中共北京市委黨史研究室主編，風雨征程（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 年），頁 178~205。

- 李尚志，「彭真視察北京新建築、新工程，希望北京市進一步解放思想、搞好改革、尊重科學，精心規劃和指導，把首都建設得更加美好」，人民日報（北京），1985年1月2日，第1版。
- 李海文，「專訪李雪峰：我所知道的文革發動內情」，共識網，<http://www.21ccom.net/plus/wapview.php?aid=99640>。
- 李海文、王燕玲，世紀對話：憶新中國法制奠基人彭真（北京：群眾出版社，2002年）。
- 李海文、王燕玲，「秘書張道一談彭真與毛澤東 1963 年後的關係」，人民網，<http://www.people.com.cn/GB/shizheng/252/9114/9116/20020929/834027.html>。
- 李莉，「憶李琪最後的日子和我的遭遇」，李莉等主編，憶李琪（北京：無出版者，2001年），頁284~318。
- 李琦，「文藝小兵憶彭真」，本書編輯組主編，緬懷彭真（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頁418~419。
- 李筠，「〈前線〉創刊的前前後後」，中共北京市委黨史研究室主編，彭真在北京（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年），頁58~62。
- 沈河，「白日點燈案」，藍盾，<http://www.fox2008.cn/ebook/landong/ladu2006/ladu20061112-1.html>。
- 岳祥口述，熊根琪、楊洋整理，「在彭真同志身邊工作的歲月」，百年潮（北京），2012年第9期，頁46~52。
- 姚監復，陳希同親述—眾口鑠金難鑠真（香港：新世紀出版及傳媒有限公司，2012年）。
- 洪長泰，地標：北京的空間政治（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1年）。
- 原北京市委毛澤東思想紅旗兵團，舊北京市委彭真反革命修正主義集團罪惡活動大事記（1949-1966）（北京：無出版者，1967年）。
- 原北京市委機關毛澤東思想紅旗兵團，大野心家、大陰謀家彭真罪惡史（1925-1966）（北京：無出版者，1967年）。
- 原北京市委機關毛澤東思想紅旗戰鬥兵團，彭真反革命修正主義集團二號頭目劉仁罪惡史（1927-1966）（北京：無出版者，1967年）。
- 原北京市委、市人委機關摧舊兵團編印、北京市革命委員會政治組宣傳小組翻印，砸爛彭真的反革命黑綱領：揭發批判彭真精心炮製和全面推行〈前線〉發刊詞的滔天罪行（北京：無出版者，1967年）。
- 孫孚凌，「一生抉擇終不悔」，中共北京市委黨史研究室主編，風雨征程（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頁2~19。
- 耿化敏，何幹之傳（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12年）。
- 郝在今，「心情最好的日子—彭真的 17 年」，報告文學（北京），2002年第10期，頁4~27。
- 崔月犁，「志趨不忘為人民—60 年革命生涯自述」，徐書麟主編，月犁：崔月犁自述及

- 紀念文章（北京：中國中醫藥出版社，2002 年），頁 3~133。
- 崔月犁，「回憶劉仁同志」，徐書麟主編，月犁：崔月犁自述及紀念文章（北京：中國中醫藥出版社，2002 年），頁 151~166。
- 張大中，我經歷的北平地下黨（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9 年）。
- 張文奇，「共產黨員不能糊塗—回憶彭真同志對我的教誨」，人民網，<http://www.people.com.cn/GB/paper83/3618/448900.html>。
- 張文松口述、韓勤英整理，「我與彭真的君子之交」，中共北京市委黨史研究室主編，研究與憶往：北京市紀念彭真誕辰 110 週年文集（北京：北京出版集團公司、北京出版社，2013 年），頁 240~249。
- 張成林，「難忘的三年」，晉察冀日報史研究會主編，人民新聞家鄧拓（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年），頁 389~395。
- 張素華，變局：七千人大會始末（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6 年）。
- 張鐮斧、陳度、冬春，「關懷航空航天事業」，彭真生平暨中共太原支部舊址紀念館主編，照片裡的故事（太原：彭真生平暨中共太原支部舊址紀念館，2012 年），頁 252~256。
- 曹瑛，叔世忠蓋—曹瑛自傳、詩文選（長沙：湖南出版社，1997 年）。
- 曹綺雯，「魂繫戰友憶宋碩」，懷念宋碩同志編寫組主編，懷念宋碩同志（北京：北京工業大學出版社，1991 年），頁 135~156。
- 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揭發批判陶鑄聯絡委員會，井岡山批陶專輯（北京：無出版者，1967 年）。
- 郭影秋口述、王俊義整理，往事漫憶：郭影秋回憶錄（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 年）。
- 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 70 年，修訂版（台北：聯經出版社，2001 年）。
- 陳徒手，人有病天知否：1949 年後中國文壇紀實，修訂版（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3 年）。
- 陳靜、韓勤英整理，「他為人民、為黨無私奉獻—趙凡同志談彭真」，中共北京市委黨史研究室主編，彭真在北京（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 年），頁 441~446。
- 彭真，「以可能達到的最高標準要求我們的工作」，中共北京市委主編，站在革命和建設的最前線——彭真同志關於北京工作的言論選編（北京：北京出版社，1992 年），頁 208~215。
- 彭真傳編寫組、田西如，彭真主持東北局（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年）。
- 彭真傳編寫組、田西如，彭真傳略（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年）。
- 彭真傳編寫組，彭真傳（第 2 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2 年）。
- 彭真傳編寫組編，彭真年譜（第 3、4 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2 年）。
- 彭珮雲、廖叔俊，「追述彭真關懷北京高等教育的光輝思想和實踐」，彭真生平思想研究編輯組主編，彭真生平思想研究（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 年），頁 328~354。

- 〈短句憶行程〉編輯組，聽媽媽講那過去的事情——紀念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60 週年（北京：無出版者，2009 年）。
- 項淳一，「我給彭真當秘書」，彭真生平暨中共太原支部舊址紀念館主編，照片裡的故事（太原：彭真生平暨中共太原支部舊址紀念館，2012 年），頁 201~205。
- 楊繼繩，楊繼繩：中國當代名人政要訪談述評集（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13 年）。
- 趙凡，憶征程（北京：中國農業出版社，2003 年）。
- 趙有福，北京通縣地區的『四清』運動（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9 年）。
- 劉光人，「劉仁的人格力量」，劉光人主編，永遠難忘劉仁同志（北京：群眾出版社，2002 年），頁 68~81。
- 劉冰，「北京記憶」，中共北京市委黨史研究室主編，並不遙遠的記憶（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 年），頁 195~256。
- 劉政，「彭真與『兩個平等』」，秘書工作（北京），2014 年第 11 期，頁 60~63。
- 劉政、張春生，「從歷史的幾個重大關節看彭真和毛澤東的關係」，領導者（香港），2013 年第 51 期，頁 136~159。
- 鄭天翔，回憶北京 17 年（北京：北京出版社，1989 年）。
- 鄭天翔，「被顛倒的事實終被顛倒過來」，劉光人主編，永遠難忘劉仁同志（北京：群眾出版社，2002 年），頁 1~12。
- 鍾延麟，「彭真在 1959 年中共『反右傾』運動中的角色和作為」，中國大陸研究，第 57 卷第 1 期（2014 年 3 月），頁 97~125。
- 鍾延麟，「彭真在 1957 年整風、『反右派』運動中的角色與作為」，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第 26 卷第 2 期（2014 年 6 月），頁 247~292。
- 鍾延麟，「周恩來與彭真關係之研究（1928-1976）」，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2014 年第 42 期，頁 261~301。
- 鍾延麟，「故紙堆中作新文章：檔案研究與中國研究」，中國大陸研究，第 58 卷第 2 期（2015 年 6 月），頁 1~21。
- 鍾延麟，「彭真與中共首都北京市的大躍進運動」，發表於「從台灣來看的中共統治和對外政策」工作坊（東京：中南海研究會主辦，2014 年 6 月 27 日）。
- 韓伯平口述，蘇峰、楊洋整理，「回憶彭真兩三事」，中共北京市委黨史研究室主編，研究與憶往：北京市紀念彭真誕辰 110 週年文集（北京：北京出版集團公司、北京出版社，2013 年），頁 296~301。
- 鶴桂林，「我要說！我要講！我要揭露」，戰報（北京），1967 年 1 月 30 日，第 3 版。
- Chung, Yen-Lin, "The Unknown Standard-Bearer of the Three Red Banners: Peng Zhen's Roles in the Great Leap Forward," *The China Journal*, No. 74 (July 2015), pp. 129~143.
- Huang, Jing, *Factionalism in Chinese Communist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 Press, 2000 ).
- MacFarquhar, Roderick,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Contradictions Among the People 1956-1957* (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4 ).
- MacFarquhar, Roderick,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Great Leap Forward 1958-1960* (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3 ).
- MacFarquhar, Roderick,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Coming of the Cataclysm, 1961-1966* (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7 ).
- Potter, Pitman B., *From Leninist Discipline to Socialist Legalism: Peng Zhen on Law and Political Authority in the P.R.C* ( Palo Alto,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
- Teiwes, Frederick C., *Politics and Purges in China: Rectification and the Decline of Party Norms, 1950-1965*, 2<sup>nd</sup> edition ( New York: M. E. Sharpe, 1993 ).
- Teiwes, Frederick C., Warren Sun, *China's Road to Disaster: Mao, Central Politicians, and Provincial Leaders in the Unfolding of the Great Leap Forward, 1955-1959* ( New York: M. E. Sharpe, 1999 ).

## 檔案

- 中華人民共和國北京市檔案館藏，「林彪同志講詞」，檔號 001-006-00059，1949 年 2 月 4 日。
- 中華人民共和國北京市檔案館藏，「彭真同志在討論北京日報工作會議上的講話紀要」，檔號 001-006-00655，1952 年 10 月 16 日。
- 中華人民共和國北京市檔案館藏，「彭真針對北大學生要求聆聽演講對宋碩的指示」，檔號 001-022-00146，1955 年 6 月 29 日。
- 中華人民共和國北京市檔案館藏，「市委負責同志招待『八大』外賓和國慶觀禮外賓遊園晚會計畫、參加人名單」，檔號 001-006-01157，1956 年 9 月 21 日。
- 中華人民共和國北京市檔案館藏，「賈星五同志關於限制在城區內開設動力在三馬力以上工廠問題的處理經過向彭真同志的報告及彭真同志的批示」，檔號 002-010-00114，1958 年 3 月 11 日。
- 中華人民共和國北京市檔案館藏，「市委、市人委為通縣、大興、房山、良鄉、順義縣、通州市劃歸北京市領導與五縣一市領導同志座談交接工作問題的記錄，彭真同志講話和有關文件」，檔號 001-006-01327，1958 年 3 月 20 日。
- 中華人民共和國北京市檔案館藏，「市委有關北京市工業發展規劃向主席、中央的報告」，檔號 00255-05-001，1958 年 5 月 3-7 日。
- 中華人民共和國北京市檔案館藏，「李先念同志在全國大、中城市副食品和手工業品生產會議上的講話要點」，檔號 002-011-00103，1959 年 6 月 23 日。
- 中華人民共和國北京市檔案館藏，「市負責同志及市級其他單位在我建國 10 週年與各

國來往賀電、賀信」，檔號 102-001-00050，1959 年 10 月 6 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北京市檔案館藏，「劉仁同志在市委工業交通系統五級幹部會議上的講話提綱」，檔號 001-015-00432，1960 年 5 月 4 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北京市檔案館藏，「全國人大代表王維舟等 9 人在京視察工作的報告」，檔號 002-012-00197，1960 年 7 月 1 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北京市檔案館藏，「彭真同志在市第四屆一次人民代表大會上的講話記錄」，檔號 001-006-02077，1962 年 6 月 19 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北京市檔案館藏，「北京市第四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關於郊區農村形勢和任務的報告（彭真同志修改本）」，檔號 002-015-00425，1963 年 3 月 16 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北京市檔案館藏，「彭真、劉仁、萬里、鄭天翔、陳可寒、鄧拓、李琪、趙凡等市委領導同志對本報稿件的審改樣」，檔號 114-001-00225，1965 年 12 月 31 日。

